



“泳”往直前

艾伦·惠特利
采访全球发展
中心创始总裁
南希·伯索尔

纤瘦、戴眼镜、慎重、理性——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看上去像是个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尝试新事物。但是人们有时会被外表所蒙蔽。

2001年，南希·伯索尔和他人共同创建了全球发展中心智库，在她的带领下，全球发展中心以创新甚至是激进而享誉世界。虽然全球发展中心已经成为业界先锋，但是伯索尔却仍喜欢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圈外人。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采访时她表示：“我们‘泳’往直前，始终致力于推动整个体系去解决本身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它而让弱势群体的生活雪上加霜。”

伯索尔近期刚刚离任全球发展中心总裁一职，但仍然是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她认为，发展的内涵应该比援助更广泛。具体来说，发展的目标应该是确保贸易、移民、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游戏规则不能受到操纵，伤害贫困人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希望向人们展示，富裕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人

民，以及如何对这些政策加以改善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我认为发展类团体和国际社会正在朝这个方向大步迈进，”伯索尔表示，“我们也似乎因为启发了别人而充当了重要角色。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空谈这个政策需要改变或者完善，我们研发出了新的产品，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切实可行地解决这些问题。”

全球发展中心提出通过“致力发展指数”（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Index, CDI）来为 27 个富裕国家排名，评估其在全球扶贫、发展影响债券对私人融资的催化、推动国际成果导向的发展项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主要刊物“Millions Saved”是针对一系列成功的公共卫生案例的研究，目前已作为教学用书得到了广泛应用。

见解独到的思想家

昆瑙·森（Kunal Sen）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及政策教授，他认为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引人深思，并将其列为学生必读的内容。“全球发展中心的特色在于针对众多话题提供新见解和想法。”他高度评价伯索尔所做的努力，是她将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 Clemens）、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全球发展中心欧洲分支机构负责人欧文·巴德（Owen Barder）等有独到见解的人聚集在了一起。“很快，该机构就成为发展政策方面的领军智库之一，”森说，“他们把充分的研究和有效的政策建议与影响结合了起来。”

像华盛顿的其他事务一样，全球发展中心也是在饭桌上谈成的。爱德·斯科特（Ed Scott）是一名企业家及前政府高官，他想资助一个致力于债务问题的非政府机构。他先后咨询了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基恩·斯帕林（Gene Sperline）、卡罗尔·兰卡斯特（Carol Lancaster）、IMF 的马苏德·艾哈迈德（Masood Ahmed）等著名专家，最终坚定了智库还应该能够解决管理、健康、教育等问题的想法。

但是，谁来负责呢？斯科特在牛津大学求学的时候就结识了奈瑞·伍茨（Ngairé Woods），在西方餐厅与伍茨共进午餐时，斯科特从盖特纳总结的候选人中进行了筛选。现任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院长及全球经济管理教授的伍茨强烈推荐伯索尔。之后，他们去见了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伯格斯坦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当时的主任，弗雷德同意赞助斯科特主导的债务研究项目。伯格斯坦说他有一个理想人选可以主导项目——南希·伯索尔。

据斯科特回忆，“就在一个小时之内，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几乎互无交集的专家都强烈推荐南希。”当时，

他还未见过伯索尔，而伯索尔当时已经在世界银行以及美洲开发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快，他就开始行动，并发现他们的想法有很多共鸣。于是，全球发展中心应运而生，斯科特、伯索尔、伯格斯坦成为共同创始人。

伯索尔仍然记得，斯科特坚决要求新中心应该以结果和影响为主要目标，而非“经济学家的沙盒”。这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她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另一个智库指导它们该做什么，但是必须有一个机构致力于促进富裕国家完善政策，造福贫困国家。伯索尔称，“近 20 年，我一直从事多边银行运作，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观察、关注、监督、评估、调整美国、欧洲等地区，以及 IMF、世界银行、其他多边机构、联合国以及企业的政策，以使其政策更加有利于发展。”

高于预期

斯科特表示，全球发展中心的发展比预期更好，旗下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员，研究范围也比自己当初设想的更为广泛。“我简直太满意了。这是一个 A+ 机构。”去年，斯科特卸任全球发展中心董事会主席一职，将工作移交给了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萨默斯从伯索尔任职于世界银行期间就已经认识她了。斯科特表示，“如果他认为这个机构不值得他费心，他也就不会接手了。”

“南希领导的全球发展中心正是‘思考为先，力在行动’的最佳例证。”

确实，萨默斯对伯索尔也是赞赏有加，因为她把这些能够真正影响发展政策的顶尖学者齐聚麾下。萨默斯称，“南希领导的全球发展中心正是‘思考为先，力在行动’的最佳例证。从尼日利亚债务免除到奖励药品研发、从保护森林到维护贸易融资，全球发展中心明确了尖锐问题。”萨默斯如今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荣誉校长。

在组建全球发展中心之前，伯索尔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经济改革计划负责人。此前，她曾分别在美洲开发银行担任了五年的执行副董事，在世界银行任职 14 年，在那升职成为政策研究部主任。

伯索尔 1946 年生于纽约，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经济领域的工作。她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圣心学院，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前往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进行深造，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正是在那里，伯索尔对发展产生了兴趣——她的硕士论文就

是关于一位劳工领袖参加肯尼亚独立斗争。但是，直到她开始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人口项目担任政策分析师时，她才开始真正理解经济学。在评估非洲学者计划书的工作过程中，她突然明白，经济学家的意见才是最可靠的。一位经济学同事在伯索尔写生育率、计划生育、女性就业等论文中曾给过她间接性的指导。她越来越相信，经济学家“很有意义”，她需要一些有关贸易知识方面的培训。于是，取得硕士学位五年后，伯索尔申请就读耶鲁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斯考特认为，除了职业经验以外，伯索尔的个人性格对于全球发展中心的运作也是一大优势。“人们喜欢她，她能听进去大家的想法，能有力地表达自己，能代表这个机构，而且人也很好。这些都有利于全球发展中心的成功。但是要说南希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些——谁知道呢？就像说 U2 即使没有博诺（Bono）还会是现在的 U2 么？谁知道呢？”

米歇尔·德·内维尔（Michele de Nevers）以前就是伯索尔在世界银行时期的爱将，现任全球发展中心研究员。他补充说，“作为领导，她最杰出的品质是强烈而广泛的好奇心。这会让人们愿意投身于觉得可能不会那么有趣的领域。”在全球发展中心 15 周年纪念演讲中，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称赞伯索尔，“用微笑、坚持、韧性，促使大家打破惯性思维。”

公认的正直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曾数次将全球发展中心的盛名归功于伯索尔的正直。正如她没有继续留在美洲开发银行或者世界银行，而是不辞辛苦来到全球发展中心，追求思想自由，在研究结果出来之前不作任何预先定论。“当她在全球发展中心称援助有利之时，就能发现，她说这样的话不是出于政治或者政策目的，而是发自肺腑的思考结果。”伊斯特利表示，“这是全球发展中心成功的原因之一。援助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尊重南希。她就是很正直。”

伊斯特利引用亲身经历来详述这一点。在世界银行任职时，伯索尔就是伊斯特利的上司，她雇佣他任职全球发展中心之时，正是他所称的由于发表争议性观点而被世界银行“建议无限期休假”之时。他回忆称，“我当时真的觉得南希就像在为我提供政治庇护。那时她这样做着实需要勇气，因为有可能触怒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这就是她正直的体现。”

伊斯特利还说，伯索尔以同样的方式坚定捍卫了全球发展中心研究员克莱门斯，克莱门斯的研究支持从穷困国家到富裕国家的移民自由。伊斯特利称，“他收到了攻击

性信件，但是南希却愿意去接纳这些争议。如果是像华盛顿盛产的那些更谨慎、更官僚主义的智库首脑一样，他们肯定早让克莱门斯闭嘴了。”

伯索尔拥有成功的事业，同时还抚养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样的伯索尔能够与自称女权主义者的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产生共鸣也在情理之中。伯索尔高度评价桑德伯格的著作《向前一步》，该书鼓励更多女性寻求担任领导职务。桑德伯格曾是全球发展中心董事会的一员，她让伯索尔明白，她比自己想的更加有野心、有魄力，也不必因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频繁出差而心存愧疚。伯索尔说“我之前和桑德伯格有点像”。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伯索尔的大学生活是由修女主导的，她们拥有自己的等级制度。“虽然我有些时候不认同她们，但现实是她们确实经营自己的社区，是真正独立的女性，自己主宰着自己的生活，”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采访时，她如此说道。伯索尔回忆称，20 世纪 50 年代，她们曾支持她的“与战后、繁荣、古板的纽约地区的非女权主义世界无意识的对立的观点”。

伯索尔承认，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女性拥有像自己和桑德伯格一样的机会。命运的纸牌对贫困国家不利。她表示：“整个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不对称的。”由于市场不是中立的，所以全球规则也不是中立的。“市场偏向于那些已经拥有某种资产的人群，无论是拥有教育资产还是金融资产，或者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制度的完备性。”

伯索尔认为需要政策来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她目前想到的是投资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举债建设道路、港口、公共交通的获益颇丰，对于贫困国家尤为如此，因此，她希望世界银行和地区开发银行能在这个问题上积极引导。她表示，这些银行的富裕国家的股东过于担心放贷带来的信誉风险，如投资水电堤坝等。“借款投资，产生收益，然后还款，这很好，这就是发展的内涵。”

授权和金钱

伯索尔还希望国有股东为其多边银行赋予明确的授权和金钱，提供全球公共财产，如农业研究，能够使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同样获利。（见本期《金融与发展》，“知识是公共物品”）。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保护穷人对抗传染病的新倡议使伯索尔深受鼓舞。但是，让她失望的是，世界银行从未正式着手解决全球集体行动问题，也没有履行职责的手段。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贷款远远不够。“这个问题困扰我十多年了，”她抱怨称，“解决这些全球问题的资金投入不足。”

除了全球公共财产之外，困扰她的就是注重成果的援助，这项活动由全球发展中心发起，旨在提高援助的有效

性。援助又称货到付款，其理念是为发展成果买单，而非单纯投入。不是预先投入，比如投资教育，而是在达到协议标准以后才付款。例如，每年完成小学教育并通过考试的孩子增加一个，就承诺给政府 100 美元，如何完成指标则是政府的问题，例如可以兴建学校或提高教师工资。但是，如果一年中有时道路泥泞无法通行，老师没办法骑车去学校，也会成为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该修路。伯索尔表示，“如果你不把这些风险和责任当场明确地分下去，就不能完全实现目标。”这是她 20 世纪 80 年代在巴西东北地区负责世界银行卫生和教育计划时获得的经验教训。“当时我主要精力都在计划投入、启动项目、分配金钱方面，没有考虑到巴西为了实现目标愿意做什么，”伯索尔在 201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会议上如是说。

伯索尔不辞辛苦来到全球发展中心，追求思想自由，在研究结果出来之前不作任何预先定论。

2010 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和埃塞俄比亚率先开始执行这项货到付款的试点援助计划。全球发展中心在一份 2015 年的文件中承认，这个计划进展缓慢，但是伯索尔并不灰心。她承认，衡量和验证某些领域的成果着实不易，但是在其他领域还是有所成效。例如，全球发展中心已经实现了运用卫星数据嘉奖那些成功抑制乱砍滥伐现象的政府。

全球发展中心以注重成果的援助为基础，还延伸出了一项鼓励计划，称为预先市场承诺。七国集团财长已于 2009 年通过了这项计划，并承诺如果疫苗研发成功，就购买特定疾病疫苗。自那时起，五个国家和盖茨基金会（全球发展中心资助者之一）已经向试点计划投入了 15 亿美元，用于研发能够预防肺炎球菌病菌株在发展中国家肆虐的疫苗。这项计划有望在 2020 年之前有效预防 150 万儿童死于该疾病。最近，全球发展中心又提出具体办法，让多边开发银行激励制药企业对抗耐药性问题，对抗耐药性已经被迅速提上了全球的首要议程。

捍卫共识

伯索尔如此支持加大全球公共财产资金投入，是因为穷人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病和金融危机等跨境风险冲击的人群。同理，研发新疫苗和应对气候变化也最能造福穷人。但是，提供全球公共财产，更确切的来说是援助，并不能包治百病。发展应该从自身开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是

成功案例。同样，近 10 年至 15 年发展迅速的非洲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开放了经济，强化了宏观基础。伯索尔表示，“我认为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她是为数不多的坚定捍卫华盛顿共识的人，该共识包含关于管理市场经济的 10 点建议，1989 年由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起草，他是伯格斯坦当时在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在批评者看来，华盛顿共识为基要主义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严重危害了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多边贷方加强严苛条件，过早要求资本自由化。但伯索尔称，这种批评舆论是对威廉姆森的诽谤，她认为他的提议是致力于宏观经济稳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的计划。她还表示，“人们讨论中忽略的一点是，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伯索尔补充说。加纳、肯尼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国家在大宗货物商品价格暴跌之前的十年里表现非常好，正是由于他们加强了宏观经济基础。

伯索尔认为，这些国家最大的挑战在于微观层面。他们的政治机构无力，国家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可以对其征税的中产阶级，从而激励他们让政府承担责任。伯索尔称，“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实行问责制和增加透明度，对于增长（尤其是包容性增长）非常重要。”

新篇章

伯索尔有意在秋季减少自己在全球发展中心的事务，以让继任者决定议程，之后她将会恢复研究员和博客、专栏、文章撰稿人的身份。她希望从事兼职工作，这样就有时间多去科罗拉多探望外孙，在第二家乡佛蒙特州醉心于园艺、小说、音乐——她丈夫弹吉他，儿子仍在为成为职业钢琴家和作曲家而“努力”。佛蒙特州离马萨诸塞州西部威廉姆斯大学不远，春季学期，伯索尔就可以每周为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生上一次课。

虽然全球发展中心的领导更换了，但是伯索尔减少全球贫困的使命依然不变。她表示，“虽然任重道远，但是越来越认识到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就是观察、监督、汇报、推动、提出新的想法和产品，使存有良好初衷的人能够更有效地做更多造福人类的事。”■

艾伦·惠特利（Alan Wheatley）是经济学作家兼编辑，曾在路透社任职，是《货币权力》（The Power of Currencies）一书的编辑兼合著者。